

清季詩史中的戊戌維新

劉學照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十九世紀末發生的戊戌維新是一次愛國救亡的政治革新運動，也是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它的深刻影響不僅彪炳史冊，而且留韻詩壇。二十年前，筆者和同事為收集中國近代歷史詩歌，曾在包括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在內的北京、上海、天津、瀋陽、長春、西安等地十九家古籍收藏較豐的圖書館查閱了大量晚清詩集，發現其中詠及戊戌維新的詩什相當可觀，且多為各有關詩總集所未收，頗具史料價值。為紀念戊戌維新一百周年，筆者謹將所見有關吟什，特別是別見的部分，編合成篇，以為戊戌維新史料的一個補頁，從若干側面凸顯這場運動的原有面貌和深刻影響。

一、「遼臺靡靡割山河，抗章伏闕公車多」

戊戌維新運動的起點是1895年的「公車上書」事件，但其原委還可溯源到1888年12月康有為的第一次上皇帝書。康有為在〈感事〉詩中注稱「時馬江敗，詣闕上書請變法」，吟有「上帝清明闐闐開，紛紜抗議上雲臺」、「治安一策知難上，只是江湖心未灰」等詩句，¹稱頌皇帝「清明」，表示自己不因上書未達而灰心。大概是由於這次事件未產生多大實際影響，所以在眾多清季詩集中未再看到有其他類似的記詠。

甲午中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老大中國被經過維新的東鄰日本戰敗，產生了強烈的歷史震撼，它在洋務運動中孕育起來的維新思想迅速升華，發展成為一場愛國救亡的維新變法運動。〈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北京，遂發生了要求拒和、遷都、變法的公車上書事件。這次上書雖又未能上達，但很快「刻遍天下，題曰〈公車上書記〉」。江蘇丹徒戴啟文有〈讀《公車上書記》〉一首，詩前有序：「夏初和議將成，適會闐試畢，直省舉子千三百餘人集議，以廣東康孝廉長素主稿，草疏萬八千字，力言目前戰守之方，他日自強之道。文甫成而議已定，不及上陳，事遂中寢。原稿印行，讀之憮然。」詩曰：

¹ 康有為：《萬木草堂詩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8。

一萬八千字，讀之含古芬。精誠泣鬼神，大筆挾風雲。蒿目憫時事，同心成至文。諫書雖未上，此草忍輕焚。²

此詩以淺顯的筆韻記詠了事件始末並肯定了事件本身的價值。

另外，江蘇華亭(今上海市松江區)朱廣堯有〈讀《公車上書記》有感〉一首；³山東萊陽王丕煦有〈公車上書記事(乙未三月)〉二首：

批鱗長鳳名猶在，嘔血陳東論不刊。漢宋英風出太學，而今沆瀣到春官。(其一)

遷都決戰一驚鳴，紙上談兵寫不平。可嘆百年興禮樂，頭巾陋絕魯諸生(時大會於松筠庵，傳觀書稿，內有遷都之議。魯籍公車多以為非策，不肯署名)。(其二)⁴

其中批鱗，即批逆鱗或謂嬰鱗，比喻臣下敢於直諫觸犯君主。春官，指作禮部的通稱。詩意稱讚陳東等漢、宋太學生敢於直諫而留芳於世，慶幸這種好的士風已流傳到現今參加禮部試的舉人。其二則記詠了山東公車因反對「遷都之議」而「不肯署名」，詩人對自己老鄉充滿儒生的固陋表示不滿。

康有為也有詩記詠這次事件，其中有「海東龍泣艦沉波，上相輶軒出議和。遼東膻膻割山河，抗章伏闕公車多。連名三千轂相摩，聯軫五里塞巷過」等詩句，⁵詠及公車們對遼東、臺灣等肥美國土被割去的無比憤懣，以及他們爭相赴會並在萬言書上署名的熱烈場面。「連名三千」是康的號稱。一般記載通稱合十八省舉人一千三百人連名。據光緒乙未上海石印書局石印本《公車上書記》所附名錄，僅六百零三人，分屬十六省，山東、河南未與。蓋初集人多，旋聞「和約」已成而「渙散」，乃至數百人「取回知單」。⁶王丕煦詩中的記詠對情況的變化，特別是山東不與的原因，提供了佐證。

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在詩壇所引起的震動，除在黃遵憲、丘逢甲等人的詩集和阿英所編有關文學專集中有強烈的反應外，在一些散見的時人詩什中也有許多不平之音。如一位小京官、江西吉安曾炎權在〈日本和議成聞之愴然涕下呈同館諸公〉中吟詠道：「海風動馬關，淒涼銷兵器。……忍辱割遼臺，犒師傷重費。威旅許駐軍，通商遍內地。咽喉與腹心，自甘輕委棄。倭約實狡黠，從此益陰覲。列強況虎

² 戴啟文：《招隱山房詩鈔》，宣統元年(1909)刊本，〈新安遊草〉卷下。

³ 朱廣堯：《徵遠堂遺稿》，丙辰年(1914)刊本，〈涇南詩稿〉卷中，頁二十二。

⁴ 王丕煦：《韜毅詩存》，民國初鉛印本，卷一，頁六。

⁵ 《萬木草堂詩集》，頁61。

⁶ 參見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增訂本)，上編，頁30；下編，頁687。

視，要挾恐援例。俎上肉雖多，豈能盡俯媚。……請看宋南渡，失策在和議。」⁷ 詩人對戰敗屈辱和所造成的危局不勝痛心和擔憂。另如浙江寧波士人陸廷黻作〈乙未四月望日生日感事示崇實書院及門諸子〉一首：

甲子平頭又一年，生逢四月月初圓。忽聞和議成盟約，彌覺憂心迫沸煎。誤國何人甘割地，救時無術可回天。正當生日還祈死，戮力中原望後賢。⁸

與他友善的僧敬安作也和詩一首，吟詠道：「相逢莫話永嘉年，痛哭金甌缺不圓。佛眼亦因坐劫閉，禪心如滾油煎。」⁹ 一位教書先生過生日，聽聞訂立屈辱條約的消息深感痛心疾首，連和尚朋友也感「禪心」如「煎」。這態度與去年那拉氏明知已「三軍敗績，割地求和」還要「萬壽無疆，普天同慶」相比，實在是兩種不同的情懷。

〈馬關條約〉所割讓的遼東因「三國干涉」得以「贖回」，但臺灣很快被日本佔領了。所以時人的詩什中不乏哀嘆臺灣的吟詠。安徽壽州（今壽縣）方希孟在丙申年（1896）有〈贈臺灣歌者〉一首：

玉蝶羅衫金縷裳，蠻鞋猶是舊時妝。一聲唱到家山破，雙淚東流望故鄉。¹⁰

江西曾炎權在〈哀臺灣〉中作這樣的發問：「珠崖一朝忽復棄，海防疏虞誰靖邊？……臺客有家歸未得，海上流寓何年還？」¹¹ 福建霞浦吳壽坤在〈題臺灣全圖後〉中有如此的感慨：

二百餘年隸版章，赤嵌絕島擁閩疆。幾經又斬蠶叢關，不料銷沉鶴化忙。沃址於今淪異域，孤軍何以挫雄鉞。深虞得隴還思蜀，東望扶桑正耀芒。¹²

詩人眼見寶島淪喪、臺胞流落、日本勢盛而國運岌危，不勝殷憂之感。

「馬關脅約恥難忘，深痛何堪此鉅創？」中國是一個內向傳統很深的國家，「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的內省意識比較強。經過公車上書事件之後，士人中激發起來的民族意識轉化為對洋務運動的反思和「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的變法自強思想。上海貢生秦榮光有竹枝詞〈機器局〉一首：「卅年求富更求強，造炮成船法仿洋。海面未收功一戰，總歸虛牝擲金黃。」何桂林在〈秋感〉一詩中更為憤慨：「廿年防海知無補，此恨空教付水流！」雲南石屏籍京官、後曾參加保國會的袁嘉穀在丙申年〈邊警〉一詩中有

⁷ 曾炎權：《蘆廬詩鈔》，1912年刻本，卷二，頁十。

⁸ 陸廷黻：《鎮亭山房詩集》，卷十，頁四。

⁹ 同上注，頁二十一。

¹⁰ 方希孟：《息園詩存》，民國八年（1919）鉛印本，卷七，頁十六。

¹¹ 《蘆廬詩鈔》，頁六。

¹² 吳壽坤：《讀我書室詩存》，卷下，頁二十。

這樣的吟詠：「千載國計計強富，富強不愁國日蹙。……何日勝算操博局，……杞人憂淚紛成行。」貴州遵義黎汝謙在〈讀史有感〉中寫道：「十數年間八表安，寰海無波號全盛。太平歲久侈心生，三海樓臺朱碧竟。國帑更濟實官錢，海軍報效尤捷徑。」他在〈書事〉中更慨然地責問：「內政自不修，外患何由平？……此咎將安歸，伊誰秉國成。」¹³

「風會特開千古局，車書真見萬方同」。黎汝謙另在〈書事〉的一首中還這樣吟詠道：

五洲千百國，於古不相通。一自道咸來，締交兼合縱。輪舟來若織，寰海遂同風。儼如古戰國，五伯遞七雄。各各務富強，精究兵與農。學校密如林，十九習商工。靜時務吸取，動時務戰攻。而我號神州，地大物又豐。泥古守成法，勢窮不變通。文士試八比，武夫極刀弓。……蕞爾倭奴國，天若誘其衷。一洗舊規模，力追泰西踪。倏忽二十年，毛羽遂豐隆。治國猶治家，衰盛乃自躬。……皇天本無私，道在人能弘。尚思英雄人，引手起孱慵。

黎汝謙是黎庶昌的侄子，曾以揀選知縣於光緒八至十年(1882-1884)間任駐日本神戶兼大阪領事(理事)，對中國值逢「千古變局」和中日政況反差強烈頗有感受，故能對中國政事守舊腐敗作出尖銳的批評。另外，湖南邵陽士人魏繇在乙未年(1895)寫了〈搏桑〉五首，用「搏桑初日曉曛曛」句開頭，中有「漫誇渤海千軍壯，終潰長崎萬馬風」句，以「一說紛紜無再誤，臣工勤勉莫婆婆」句結尾。搏桑，即扶桑，指稱日本。魏繇是魏源的孫子，與陳三立友善。陳給他的贈詩中有「爾祖聲名煥日星」之句，表示了對其祖的尊崇。魏繇用「搏桑」即日本作為吟詠甲午戰爭的詩題，詩中有日本國勢如日初升的稱詠，勸諫當政者不要徘徊再誤，實也有仿日自強的蘊意。如所周知，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於檢討清朝在法度、官制、學校、兵農等方面的問題後指出：「方今當數十國之覬覦，值四千年之變局。……今之為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上；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又說：「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敢……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鑒。」¹⁴應該認為，黎汝謙、魏繇等上述官員士人在吟什中所表達的看法和心聲，正是康有為等維新派在〈公車上書〉中主張效法日本變法的社會思想基礎。

¹³ 周鐘嶽：《惺庵詩稿》，卷一，頁五；秦榮光：《上海縣竹枝詞》，民國元年(1912)鉛印本，頁二十三；阿英(編)：《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頁122；袁嘉穀：《臥雪堂詩草》，〈九龍池集〉，頁二十八；黎汝謙：《牢溪生詩稿》，手寫本。

¹⁴ 邵軫：《後山詩稿》，載阿英：《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頁74；《牢溪生詩稿》；魏繇：《邵陽魏先生遺集》，民國壬申年(1932)建德周氏影印本，頁二十五、二十六；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上冊，頁122，136。

二、「聞說山河要分裂」，「應合民權救我疆」

戊戌維新是一場以愛國救亡為直接動因的「學習外國改革政治」的運動。「公車上書」後，康有為聯絡帝黨文廷式等京朝士大夫數十人成立了以陳熾為會長的強學會。他有紀事詩，請看以下詩句：「山河已割國搶攘，憂國諸公欲自強。復社東林開大會，甘陵北部預飛章。」康自比於明末東林復社士人的集社，並記稱：「割臺行成後……同開強學會於京師，以為政黨嚆矢，士夫雲從。御史褚成博與大學士徐桐惡而議劾。」¹⁵ 其時福建安溪林鶴年也有〈書強學會〉詩，寫道：

部洲五大論強學，滄海靈鯨一柱擎。萬派根源歸學海，千秋擔荷屬儒生。道原經術通時務，兵協戎機審國情。何待楚材資晉用，二三豪傑答升平。¹⁶

林鶴年，舉人出身，甲午戰爭前幾年去臺灣承辦茶釐船捐等局，後籌辦全臺鐵路。甲午戰爭中在臺灣抗日，失敗後內渡返鄉。他在詩中盛讚京朝士大夫放眼「五大洲」，講論強國之學，「通時務」，「審國情」，肩負救國重擔。可見他是強學會在福建的支持者。

戊戌維新走向高潮的導火線是膠州灣事件。膠州灣事件以及由此而起的割地狂潮使甲午戰後激發起來的民族救亡意識進一步升華。對當時德、俄、英、法等國強索租借地的侵略行徑，安徽懷寧舒鴻貽有組詩紀其事。這些詩的題目是〈德國以教士二人在山東被戕，佔據膠州灣，明年與訂租膠州灣條約，以九十九年為期〉、〈俄據膠州灣租借成約，援利益均沾之利，要求旅順大連灣簽定租借條約〉、〈旅大既訂租約，是年六月，法以保護越南為名，要求簽訂廣州灣之約。而英之租借威海衛契約，亦於七月簽訂〉。他在詩中發出了沉痛的哀嘆：「後患從此滋，前例無可擬（租借二字在國際法上鮮有先例）。……嗚咽淚滂沱，難湔削地恥。」另外，廣東新會林文聰也有紀事詩〈英人既拓九龍界並索築路權〉、〈外人連年脅租膠州、旅順、大連、威海、九龍、廣州灣諸租界〉等多首，哀嘆：「國力傷哉終不振，港灣存者已無多。」膠州灣事件後充滿這樣危亡感的紀事詩還有很多。江蘇山陽（今淮安）徐嘉有〈聞膠州警〉，浙江烏程（今湖州）秦福基有〈聞膠州近事書感〉。江蘇梁溪（今無錫）蔣士超（字百里）有〈感事〉三首，其中吟詠道：「俄虎英獅總禍胎，列強互制暗相猜。」「劃後鴻溝餘漢土，市殘駿骨剩燕臺。」「悵望中原四百州，山河破碎使人愁。日回大地難成曉，氣肅胡天總是秋」。¹⁷

¹⁵ 《萬木草堂詩集》，頁63。

¹⁶ 林鶴年：《福雅堂詩鈔》，《萬梅集》，頁十。

¹⁷ 舒鴻貽：《宜園詩稿》，頁三、四；林文聰：《避庵詩存》，卷上，頁五、六；徐嘉：《味靜齋詩存》，民國壬申年（1932）上海中華書局仿宋版，卷九，頁十四；秦福基：《玉壺天詩錄》，頁六；蔣士超：《振素庵詩鈔》，宣統元年（1909）刊本，卷二，頁四。

膠州灣事件後中國遭受的民族屈辱是嚴重的。維新派人士黃遵憲在〈書憤〉中這樣概括了陸危的局勢：「一自珠崖棄，紛紛各倣尤。瓜分惟客聽，薪盡向予求。秦楚縱橫日，幽燕十六州。未聞南北海，處處扼咽喉。」「弱肉供強食，人人虎口危。無邊畫甌脫，有地盡華離。爭問三分鼎，橫張十字旗。波蘭與天竺，後患更誰知！」¹⁸林則徐的長孫林賀峒在〈膠州感事〉中表達了這樣的悲憤：

寇氛遽已塞滄溟，眼前膠西失翰屏。十萬空磨延廣劍，五千未涉單于庭。和戎無利猶師絳，誰將諸賢合憶青。聞說山河要分裂，悲筳永夕不堪聽。¹⁹

福建汀州（今長汀）人、宗室寶廷的弟子康詠在其〈雜詩〉中則高呼民族救亡：

美人掣我肘，歐人扼我喉。俄人拊我背，倭人摧我頭。蒼天構奇禍，凌遲到神州。英雄恥任運，誓志完金甌。安知非啟聖，先之以殷憂。黃種四萬萬，慎勿忘國仇！²⁰

黃、林、康的詠述，把中國將變成波蘭、印度的前景和一幅血迹斑斑的瓜分圖展現在人們的面前。

中國當時所面臨的危局和困境，西方史學家曾作過這樣的評論：「在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擁有中國十分之一的領土和人口的國家，曾經遭到過中國1897年11月到1898年5月這六個月中所遭到的那樣一連串的屈辱。我們不妨補上一句，也沒有一個國家在行政上的那些公認弊病的改革方面，在具有很多優良品質的堅強民族所居住的一塊極其富庶的土地上一切資源的組織方面，曾經表現出這樣的無能。」當時一些正直的官員和士人對清廷在內政和外交方面的腐敗與無能是非常憤懣的。軍機處章京陳熾在強學會改為官書局後仍「用事」，他在〈感事〉中有這樣的憤慨：「徙薪不及早，燭火能燎原。……當斷不能斷，揖盜徒開門。」時任廣東學政的張百熙在〈秋感〉中，表達了這樣內憂：「未信東南物力微，連雲番舶駛如飛。農商交病民生索，盜賊公行吏事非。」四川富順劉光第是進士出身，時任京官。他在甲午年寫的〈萬壽山〉中，用「膏血為塗丹，皮骨為版築」等詩句揭露清廷腐敗，竟挪用海軍經費造頤和園。他又在戊戌年前夕寫的〈京師蔬菜漫賦〉中記詠家鄉四川的災情，發出這樣的感嘆：「飽食長祝太平年，不識國危顛可憐。草根樹皮食已絕，故里哀鴻眼流血。」江蘇陽湖（今常州市）士人潘振華在戊戌年初所寫的〈重有感〉中作這樣的感嘆：「從此憂生事，強夷覬覦多。先時機已失，當軸意如何。國已空杼柚，賢宜假斧柯。聖明宵旰

¹⁸ 黃遵憲（著）、錢仲聯（箋註）：《人境廬詩草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下冊，頁767，772。

¹⁹ 林賀峒：《味雪堂遺集》，宣統元年（1909）刊本，頁六十五。

²⁰ 康詠：《漫齋詩稿》，1918年石印本，頁六十六。

揚，誰與鎮山河？」江蘇江寧（今南京市）舉人陳作霖在膠州灣事件後所作的〈感憤〉詩中這樣寫道：「南洋與北洋，膠實扼中央。……樞府無奇策，紛紛只議和。……法亦無從變，事真不可為。富強皆夢囈，文武總兒嬉。……野人無遠慮，概誦楚茨詩。」²¹ 他因痛感國土被割而朗誦運用「思古」方式譏切時政的《詩·小雅·楚茨》篇，顯然是為了表達要求變法救亡的心聲。

到戊戌年，要求變法的呼聲已非常強烈，以致在庭院閨閣中也有反應。湖南蘄水郭筠在她所寫的〈有感〉中這樣吟詠道：「轉電時聞警，妖氛日跳樑。陸鄰頻割地，輪帛屢傾囊。四海瘡痍苦，連年水旱荒。寰輿非樂土，宵旰意徬徨。官守勞存問，軍需待計量。……變法心逾激，偷安膽未嘗。未遑驅劣馬，先已告亡羊。涸轍難紓困，危邦若探湯。婦嬰應共憤，賢哲盡凋傷。……煉石終期補，揮戈引領望。」²² 郭筠，字誦芬，曾國藩子曾紀鴻之妻，其長子曾廣鈞，光緒己丑年（1889）進士，官廣西知府。乙未年參加北京強學會。其次子曾廣銓，幼年時承嗣給伯父曾紀澤，後隨同赴歐在法國讀書，十六歲歸國。丁酉年（1897）與葉翰、汪康年在上海創辦《蒙學報》，鼓吹啟蒙民智。郭筠在詩中表達的對外患內憂局勢的擔憂，憧憬天子大開「明堂」「變法」，表露了庭院深處婦女的共憤和心聲。稍後，狄葆賢在《平等閣筆記》中，述及他在遼陽旅店中看到一女子的題壁詩，其三云：「無計能醒我國民，絲絲情淚搵紅巾。甘心異族欺凌慣，可有男兒憤不平？」正如梁啟超所認為：「讀之亦可見女權消息之一斑。」²³

「五洲大變榛狃俗，喚起人間瞋睡魔」。甲午後維新派為了從根本上實現民權變革，極力通過開學會、辦報紙，進行開啟民智和改變陋俗的宣傳。鄭觀應在《羅浮待鶴山人詩草》中有〈不纏足歌〉，記詠了不纏足運動由粵、湘向上海的推開。1897年7月，梁啟超、譚嗣同、汪康年、康廣仁等在上海發起不纏足會，於《時務報》刊布章程。²⁴ 鄭觀應此歌便寫於此時。另外，林紓因用古文譯述歐美小說而名於時，他也曾用詩進行思想啟蒙的宣傳。他1897年所撰〈閩中新樂府〉三十二篇是因「聞歐西之興，亦多以歌訣感人」而作，勸喻激士氣、重武臣、興女學、不纏足、重習藝、禁鴉

²¹ 馬士、宓亨利：《遠東國際關係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年），下冊，頁412；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卷一百七十四，頁二；張百熙：《退思軒詩集》，宣統二年（1910）武昌刊本，卷五；劉光第：《介白堂詩集》，光緒癸卯年（1903）宜賓儷嶺書屋刊本，卷下，頁四十四；潘振華：《鷗舫詩文鈔》，民國甲子年（1924）上海刊本，卷二，頁二十八；陳作霖：《可園詩存》，宣統三年（1911）刻本，卷二十，頁三。

²² 郭筠：《藝芳老人詩存》，宣統二年（1910）上海鉛印本，頁九。

²³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3。

²⁴ 唐才常：〈失題〉，載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唐才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61；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07；《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下冊，頁801。

片、知時務、改營制、倡實學、重養蒙等。如〈村先生〉對「村先生，貌足恭，訓蒙〈大學〉兼〈中庸〉」進行了譏諷，歌詠說：

我意啟蒙首歌括，眼前道理說明豁：論月須辨無嫦娥，論鬼須辨無閻羅。勿令腐氣入頭腦，知識先開才有造。解得人情物理精，從容易入聖賢道。今日國仇似海深，復仇須鼓兒童心。法念德仇亦歌括，兒童讀之涕沾襟。村先生，休足恭，莫言芹藻與辟雍，強國之基在蒙養，兒童智慧須開爽，方能陵駕歐人上。

他在〈興女學〉中歌詠道：「興女學，興女學，群賢海上真先覺。果立女學相觀摩，中西文字同切磋。……母明大義念國仇，朝暮語兒懷心頭。兒成便蓄報國志，四萬萬人同作氣。女學之興係匪淺，興亞之事當其成。」在〈知名士〉中「嘆經生詩人之無益於國」，作出「解否暹羅近漸強，一經變法生民康」的發問，勸喻經生名士勿再「作夢」，應講求「變通」。²⁵ 林紓在政治上不能算是維新派，後來的思想又保守。但在膾炙人口的《閩中新樂府》中，其思想啟蒙乃至變法救亡的說教躍然於紙上。可以這樣說，除了康、梁、譚、嚴等維新派外，在戊戌維新運動中不少士人都不同程度地鼓吹啟蒙與變法。這正是變法維新運動能夠走向高潮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思想動因。

戊戌維新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是洋務運動中孕育的早期維新思想的發展與升華。「公車上書」不久，光緒帝飭總理衙門將鄭觀應《盛世危言》刷印兩千部分送臣工閱看。後又翻印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和湯壽潛的《危言》等書，命部卿寺堂司各簽注意見。浙江杭州士人、八千卷樓主丁立誠在戊戌〈雜感〉中有「校邠抗議太紛紜，盛世危言樹一軍」的記詠。江西新建人、戊戌進士程道存在〈讀校邠廬抗議湯子危言〉詩中歌詠說：「馮湯感事變，治國用刀圭。……朝廷亟變法，簽注命曹司。」²⁶ 這表明早期維新思想在戊戌維新中仍有其影響，也說明戊戌維新與早期維新思想有思想上的連續性。

「追蹤能否遷地良，但願自強聖天子」。²⁷ 維新變法運動進入戊戌年，維新派通過帝黨官員開始了與光緒帝直接溝通。公車上書後的兩個月間，康有為又兩次上書，只有第三次上書能夠上達，光緒帝表示讚許。1897年12月膠州灣事件起，康有為趕到北京，第五次上書，籲請採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並請國事付國會議行，請頒行憲法。次年1月24日，光緒帝命王大臣延見康有為於總理衙門。1月29日康有為上〈外憂危迫，分割洵至，宜大誓臣工，開制度新政

²⁵ 林紓：《畏廬詩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32年）。

²⁶ 丁立誠：《小槐窠吟稿》，1919年刊本，卷四，頁八；程道存：《可乎不可乎不可軒詩草》，民國辛酉年（1921）鉛印本，卷上，頁三十四。

²⁷ 《臥雪堂詩草》，頁二十二。

局摺〉。旋又第七次上書。接著，在北京立保國會，略具政黨規模。但很快遭到頑固派的彈劾。光緒帝說：「會名保國，何罪之有？」乃得免。康有為有詩紀其事：

八表離披割痛傷，群賢保國走彷徨。從知天下為公產，應合民權救我疆。八俊三君自鉤黨，周鉗來網巧飛章。書門幸免誅臣罪，明聖如天賴我皇。²⁸

三君、八俊，東漢末年反對宦官專權的陳蕃、李膺等有名望的士大夫，喻指保國會人士。周鉗來網，武則天時的酷吏周興和來俊臣張設的鉗制和陷害忠良的羅網，喻指上書誣陷保國會人士的頑固派。詩意是，士大夫痛心邊疆被割，為保國繁忙奔走，向來知道天下是大家的道理，應該合國民固有之權來保救天下。雖然頑固分子急上奏章誣陷，但因皇帝聖明得以幸免。

戊戌維新是一場高舉仿日旗幟的政治變革運動，根本大旨是提倡民權，最終行君主立憲。但到戊戌年間康有為等維新派與光緒帝得到溝通後，又提出「乾綱獨斷」，希望光緒帝能「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治譜」。這種希望實代表了許多士人的共同看法。膠州灣事件後，浙江烏程（今湖州市）士商李世伸寫有古樂府〈俄羅斯〉一首，詠及：「俄王大彼得，即位才十七。能將陋習除，忘尊學藝術。庶政倣歐西，法變恐不疾。創出海軍雄，遂與大邦匹。」另外，安徽歙縣諸生洪汝怡作〈日本東都雜興詩〉，歌詠日本「一自歐羅新政闢，廿年雄長大瀛東」。²⁹ 實際上，從林則徐和魏源在《四洲志》和《海國圖志》中盛讚彼得微服赴西歐習藝歸而變政強俄以後，中國講了六十年大彼得的故事。至於日本，從洋務運動起，李鴻章就有欽羨日本的思想，王韜、黃遵憲、鄭觀應等有早期維新思想的人士，更有讚美日本「開議院」的言論。³⁰ 但直到甲午戰後，特別是戊戌年，康有為向光緒帝進呈《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以後，近三十年的「稱道日本變法致強之故事」的聲浪才衝破「習俗」，成為有實際意義的政治變革波濤。鄭觀應在〈讀《俄彼得變政記》日本明治變法考有感〉中歌詠道：

證今考古事推枰，英主何曾泥守成。天以艱難資振奮，世將中外合升平。臥薪嘗膽師勾踐，撓舊維新企漢京。此際朝廷求變法，可如俄日力經營。

另外，鄭觀應在有關詩什中，多有這樣的吟詠：「歐洲議政院無私，究竟君民共主宜」、「日本與議院，公論如秉炬」、「事非集眾思，淑慝恐難辨。下情得上達，大哉

²⁸ 《萬木草堂詩集》，頁89。

²⁹ 李世伸：《屈翁詩稿》，〈秦西新史雜詠〉，頁三；洪汝怡：《寄蓂詩存》，卷一，頁十。

³⁰ 參見劉學照：《洋務思潮與近代中國》（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4年），頁287-89。

議政院」、「急求立憲開民智，上下同心撫字仁」。³¹可見，鄭觀應在政治上雖未參與戊戌維新，但在思想上是贊同仿倣俄日變政的。他傳韻在詩什中的「開議院」、行「立憲」言論除了語氣平和外，同康梁維新派的民權思想大體上是膾合的。

三、「嚴敕頒新政，疆臣猶舊謨」

百日維新是戊戌維新運動的高潮。或由於其來也匆匆，去更匆匆，在眾多清季詩什中竟很少見有正面反映其具體經過和舉措的記詠。湖南瀏陽士人劉兆涵所寫〈戊戌時事六感〉稍詠及此事，試錄最後兩首：

海內新機激便開，求賢館築仿金臺。東山人往微言絕，西法工兼眾智裁。變計力圖多難日，問心誰是不凡材。篤行有序先明辨，徒尚紛更萬事灰（變法）。

（其五）

官禮煌煌萬古垂，自來經世有成書。致和格物皆聖教，好學深思賴後賢。西土尚知宏製作，中才何竟域柔愚。果能此道砭孱弱，葆我強明絕覬覦（觀成）。

（其六）³²

劉兆涵時年已七十歲。雖然老人仍不脫經世思想的窠臼，對變法步驟的急切或有保留，但他認定維新變法是「海內新機」激發而成，贊同採用「西法」、「力圖變計」、宏揚「製作」、去除「柔愚」，很大程度上表明他是戊戌維新的贊同者。

「維新與守舊，朋黨分其途」。³³自公車上書以來，特別是頒布〈明定國是〉詔以後，維新變法運動中充滿新舊之爭和帝后黨權力之爭。一個顯著的事例是，詔定國是後四日，即6月15日（四月二十七日），光緒帝師傅翁同龢被開缺回籍。關於此事，時人的記載和史家的評述向有異議。一般認為這是由於后黨的排斥傾軋，也有以為主要是出自光緒帝的本意，認為戊戌春三月以後翁從支持變法轉為壓制維新派，「說慈禧強迫光緒諭黜翁同龢的說法，缺乏歷史根據」。³⁴但就康有為來說，他對翁師傅一直是懷有深情的，翁被黜後，他有〈懷翁常熟去國〉詩：

³¹ 《鄭觀應集》，頁1311-12，1291，1300，1329，1360。

³² 劉兆涵：《存知堂詩集》，民國十六年（1927）仁和石印局刊本，卷中，頁四十四至四十五。

³³ 章鐘亮：〈哀京官〉，載孫雄：《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六編，下冊。

³⁴ 孔祥吉：〈光緒與戊戌維新運動〉，載《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述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02。

膠州警近聖人居，伏闕憂危數上書。已格九關空痛哭，但思吾黨賦歸歟。早攜書劍將行馬，忽枉軒裳特執裾。深惜追亡肅相國，天心存漢果何如。³⁵

詩意是記詠膠州灣事件後，他屢次上書不達準備回鄉講學，翁屈尊造訪「執裾」留行，比況於當年肅何追韓信的故事，對翁回籍深感惋惜。翁被逐後也有〈將之江右視筱珊侄〉詩：「海程行過復江城，無限蒼涼北望情。傳語蛟龍莫作劇，老夫慣聽怒濤聲。」³⁶抒發了「北望」的「無限蒼涼」而又準備平靜對待的感受。

翁的去國，帝黨官員是頗為依依的。總署章京李岳瑞在所撰《春冰室野乘》〈記翁協揆去國〉篇中，引朱祖謀《彊村詞》中〈丹鳳吟〉一首，該詞韻繪「別腸寸寸」、「已是一江潮落」的情景。³⁷但是，非帝黨官員的對此事卻別抱情懷。請看江陰士人張洵佳〈紀某師傅事〉二首：

真個黃梁入夢中，一生遭際竟全空。雷霆震厲乘時降，甲第恩榮到此終。江陵死後才騰謗，白髮當朝較勝公。(其一)

摸索人才在暗中，辨奸無識愧蘇公。殺身忍使三良殉，造膝難將九陛蒙。罪案一朝終坐實，師恩兩代盡翻空。文端肖子文勤弟，老向江湖作釣翁。(其二)³⁸

張洵佳，字少泉，生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優貢官至河南知縣。因受袁世凱的援引而得到快速升遷的徐世昌為其詩鈔作序並自稱「門下士」。張詩充斥著嘲諷貶責之詞，喻諷翁的結局連張居正也不如，實代表后黨以及一般反維新人士的態度和心聲。

戊戌維新期間的變法措施遭到了后黨和頑固勢力的抵制和反對。一些號稱開通的洋務大員也是從旁觀望，靜待太后臉色行事。所以，一系列變法詔諭難以推行。光緒帝雖說親政，但仍需時時秉承「懿旨」。僅「百日維新」期間，赴頤和園「請安駐蹕」凡十二次。³⁹維新派著名人士張元濟在〈追述戊戌政變雜詠(有序)〉中詠及：

帝王末世太酸辛，洗面長留涕淚痕。苦口叮嚀宣國是，憂勤百日枉維新(當時內侍，亦尚有忠於德宗者，如寇良材之徒，嘗對人言，德宗在宮內，每於無人獨坐之時，頻頻嘆息，掩面而泣。又言西后性情暴躁，對於德宗一言不合，即責令長跪不起，故德宗入覲問安時，覲棘萬狀)。⁴⁰

³⁵ 《萬木草堂詩集》，頁90。

³⁶ 翁同龢：《瓶廬詩稿》，光緒乙巳年(1905)刊本，第三冊。

³⁷ 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363。

³⁸ 張洵佳：《愛吾廬詩鈔》四編，宣統二年(1910)鉛印本，頁十。

³⁹ 《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下冊，頁807。

⁴⁰ 《戊戌變法》，頁352。

這詩序中所說內侍寇良才，一作寇連材，因忠於光緒帝而對慈禧不滿，於公車上書的第二年被殺。湖南湘潭周大烈後有詩追詠：

寇監陳詞動上京，冤沉菜市竟成名。親裝小冊交兄手，噴血含嗔字有聲（內監寇連材見孝欽歸政後猶獨攬大權，且日侈縱，屢次泣諫。光緒二十二年誓死上書十條，首請勿攬政權、勿駐蹕頤和園。后大怒，殺之菜市。寇監於上書先數日歸，決其父母。以所記宮中事一冊，授其兄，言孝欽后驕侈淫佚及虐待德宗事）。⁴¹

寇監的被殺以及帝黨人士文廷式被牽連逐歸事，當時流傳很廣。具體情節或有參差，但寇監見殺的主要緣由或當如此。長期以來，有一種看法認為：「其實慈禧但知權利，絕無政見，……若奉之以變法之名，使得公然出頭，則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頑固大臣皆無能為也。」⁴²從以上光緒見虐等史實來看，這種看法把政治鬥爭過於兒戲化，實是一種一廂情願的皮相之見。

戊戌維新是一場深刻的近代社會政治變革，它廢八股，改官制，觸動了一大批官員和士人的既得利益，遭到了他們的不滿和反對。貴州貴陽司炳奎所作〈戊戌感事八章〉可資佐證。試錄兩首：

千年大法一朝斬，關係豈惟在一朝。八比先亡湯沃雪，三場繼罷海奔潮。人間風教全旋轉，天上星文定簸搖。紀事書名垂簡冊，後賢讀史自昭昭。（其一）
不競人材可奈何，都將國弱咎巍科。談心說性嫌空幻，述語稱謔笑舛訛。夏校已看生棘草，孔庭行見出妖魔。瞻烏欲集誰家屋，飛夢依稀上大羅。（其二）⁴³

此人是科舉制等舊制度的維護者，詩中對廢八股、改科舉、旋轉「風教」表現出一片憤懣和哀鳴。

戊戌維新史表明，新舊思想鬥爭在兩湖表現得尤為劇烈。「〈勸學〉兩篇通內外，空談畢竟亦浮雲」。⁴⁴張之洞在強學會創立初那陣子表現得相當時髦，但當1898年4月維新運動走向高潮時，他趕快發表〈勸學篇〉，如其所稱：「戊戌僉任何隙，邪說遂張，乃著〈勸學篇〉上下卷以闢之。」他後有詩〈學術〉一首表達對清季思想變遷的深惡痛絕：

⁴¹ 周大烈：《桂堂清故宮詩一百首》，頁七。

⁴² 王照：〈方家園雜詠二十首並紀事〉其三，載《戊戌變法》（四），頁359。

⁴³ 司炳奎：《寧拙堂詩集》，己未年（1919）刊本，卷八。

⁴⁴ 〈小槐窠吟稿〉，卷四，頁八。

理亂尋源學術乖，父仇子劫有由來。劉郎不識多葵麥，只恨荆榛滿地栽。（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庵，經濟講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後風氣也，遂有今日，傷哉！）⁴⁵

近年來有的論者因見張之洞在《勸學篇》的外篇中大講「西學為用」而讚譽有加。但忽略了甲午以後潮流已非當年倭仁時可以相比，時尚已不在一般地談「西用」，而在於用「西學」去「破」「中體」了。耐人尋味的是，正是大講「西用」的張之洞，卻揮動「學術」大旗，充當反維新、保「中體」的大帥級人物。浙江平陽籍維新思想家宋恕在丙午年（1896）〈贈譚復生〉一詩中述及他「與張尚書論治術」，「格格不入」。甲午後主張維新的章太炎曾對張之洞寄予希望。章在戊戌政變後卻對宋恕等人說：「今日中國之反覆小人陰險巧詐者莫如兩湖總督張之洞。」⁴⁶究其故，當因張喜以「學術」「關」「維新」、「正」民權的原故。

張之洞在武昌揮動「學術」大幡，王先謙、葉德輝等在長沙以保衛孔門「至教」相標榜。王先謙在戊戌年寫有《狂子行》一首。他在詩中把維新派人物比喻為清初因曾靜案被殺的張照和因莊廷鑑《明史》案文字獄被殺的吳炎。請看其詩：

官不可為去作賊，用夷變夏胡可得？民權陰襲拿破倫，教祖欲追摩哈墨。滔天捲地誰復論，但見魚爛龜鼉奔。陳相自悅許行學，曾靜實喪張熙元。神祖聖伏綿千載，至教昭垂日星在。春秋如線終一匡，不信橫流倒滄海。中行之背何足答，憂時賈傅勿嘆咨。君不見張吳兩狂子，只有流傳題壁詩！⁴⁷

此詩寫於戊戌政變後，康梁等已逃亡，譚嗣同等已被殺，王自然可以公開罵他們為「賊」了。除此，他加給維新派的主要罪狀是「陰襲」「民權」和「用夷變夏」。應該認為，王先謙在洋務運動中期以後是主張「師夷」的，他的許多作為不同於倭仁等頑固派。甲午後時代潮流急遽發展，他和大講「西學」的張之洞一起與原先就頑固守舊的分子結成反維新、反民權的思想統一戰線，這是一個頗值得思索的歷史文化現象。

王先謙在戊戌年還寫有〈贈葉德輝奕彬四首〉，詩序中稱：「戊戌秋八月，康有為謀逆事覺，其黨康廣仁等皆伏誅。先一歲，湖南創設時務學堂，大吏延康弟子梁啟超為教習，學使徐仁鑄相與主張，其說一時風靡。獨奕彬辭而闕之，不以昔年出徐門下有所畏避。復與先謙等上事大吏，貽書友朋，匡救之功，無與倫比。康所行所學，唯奕彬知其深，而先謙不及知。其說之盛行，在先謙出都後，每聞其黨徒論議，但相與駭怪而已。得吏部言，乃悟其別有宗主也。……誠亂臣賊子之尤也。湘人不幸，被害者多矣。微奕彬，誰與摧陷而廓清之者。」試錄其所贈絕句兩首：

⁴⁵ 張之洞：《張文襄公詩集》，卷四，頁七。

⁴⁶ 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下冊，頁803，1048。

⁴⁷ 王先謙：《葵園四種》（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頁627。

曲士思偷造化權，戲書容易發爭端。此曹但可供談笑，早作妖要亂領看。(其一)

荒唐我亦怕新書，一任摧燒不願餘。魯國聞人真再世，孔門今見四盈虛。(其三)⁴⁸

王在詩中表現得很謙虛，把湖南保衛「造化權」的首功奉推給後輩葉德輝，並稱所以能深知「康所行所學」是受了葉的影響。這當是事實，不啻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一條可信的史料。

戊戌維新是在這樣的政治思想環境下展開的，后黨和頑固派的破壞自不待言，同治以來一向號稱開通的洋務派大員們見「帝」無權，在「詔定國是」後差不多也都是向「后」看。他們因循玩愒，不肯力行新政，即使遭到嚴旨切責也仍是我行我素。這樣，關心維新變法命運的人士發出「嚴敕頒新政，疆臣猶舊謨」⁴⁹的感傷就不足為奇了。

四、「此變乾坤古未逢」

「殿上君臣神慘淡，燈前兒女淚縱橫」。到戊戌七月中旬以後，維新與守舊兩黨鬥爭日趨劇烈。八月初三(9月18日)，楊崇伊與榮祿密謀後向慈禧呈遞請求即刻訓政的密摺。次日，慈禧由頤和園回宮，待光緒帝於八月初五(9月20日)接見伊藤博文後，於八月初六正式宣布「訓政」。八月初八，光緒帝率群臣「恭賀」「訓政」，被禁於瀛臺。關於戊戌政變的起因和經過，王照〈方家園雜詠二十首並紀事〉記詠頗詳。⁵⁰關於譚嗣同等六君子被害情況，唐烜〈戊戌紀事八十韻〉吟詠較多。述及六人臨危不懼時有這樣記詠：「林君最年少，含笑口微呖。譚子氣未降，餘怒沖冠髮。二楊默無言，俯仰但蹙額。劉子木訥人，忽發大聲詰：何時定爰書，何人為告密？朝無來俊臣，安得反是實！抗辯語未終，群隸競牽掣。」⁵¹唐烜，字照青，直隸鹽山(今河北)人，光緒進士，時任刑部主事。詩中自稱「我時官西曹，濫膺折獄職」，即「六君子」被害時他在場。他在詩注中說，與楊銳為「乙酉同年」，與楊深秀和劉光第均為「刑部同官」。他參與行刑僚友，故詠稱自己一時「木立若朽質」。詩中詠嘆說，「峨峨四新參」，「輒思大廈扶，竟觸天柱折。其一職監察，抗疏氣鬱勃。同官側目久，飛語相詆訐。更有粵布衣，「連坐太突兀」。為「軍機四卿」和楊深秀、康廣仁鳴不平。可見他是維新派的同情者。他「為憤所切」，把親見如實地記詠下來，當可佐輔記載之或缺。

⁴⁸ 同上注，頁625-26。

⁴⁹ 王師曾：〈戊戌政變感賦〉，載《柱頰樓詩鈔》，1919年鉛印本，頁三十二。

⁵⁰ 《戊戌變法》(四)，頁359-62(選有五首)。

⁵¹ 《晚晴移詩匯》，卷一百七十七，頁一至二。

戊戌政變後，陳懋鼎寫有〈前緹騎行〉和〈後緹騎行〉，對京城禁衛捕殺「六君子」也有具體記詠。⁵² 陳懋鼎，字徵宇，福建閩縣人，與鄭孝胥、林旭同年，一時有福建三解元之稱。光緒庚寅年(1890)他與其父陳仲勉一同中進士，豔稱一時。此時在總署作官。他在詩中相信林旭是「明良」之輩。他詠稱一度聽到「宮車晏駕」的訛言時曾十分「淒傷」。「夜來宮禁事非常」，「急書三返召畿帥」，遂有「大獄興倉黃」。這些詠述得自「侍臣」之口，亦當有史料價值。

清季詩什中對戊戌政變的記詠還有很多。其中多為同情維新譴責政變之作。黃遵憲有〈感事〉八首，嚴復有〈戊戌八月感事〉一首，安徽懷寧舒鴻貽寫有〈感賦〉一首。江蘇淮安舉人顧震福作〈戊戌紀事〉一首。安徽桐城進士姚永概作〈戊戌秋中書感〉兩首，有這樣的吟詠：「孤月驚揚已斂輝，紛紛狐鼠煽陰機。虛傳天位能移易，不信人間有是非。」「此變乾坤古未逢，盱衡唐漢略相同。」「腐儒難繼陳東迹，中夜悲歌和朔風」。詩人對「狐鼠煽陰機」發動政變無比憤慨，對自己無能為力挽救「古未逢」的「政變」不勝感傷。江蘇吳縣舉人曹元忠有〈誰遣〉、〈詠史〉等詩。他是《公車上書》的題名者，他在詩中對「從此六州都鑄錯」、「眼前何處不新亭」、「胡服空言趙武靈」即「仿日」維新的失敗，感到無比憤懣和哀嘆。江西崇仁黃維翰時在黑龍江作地方官，他寫有〈戊戌讀史雜感〉四首，詩中對光緒帝的「夢寐中興聖主心」和維新派的「密疏從容啟聖明」、「欲為君王購太平」予以稱頌和讚許。廣東東莞士人黎樹勛寫有〈雜感戊戌作〉四首，確信「正氣日星留菜市」，「民隱向來未可欺」。⁵³

在譴責政變的吟詠中，不乏韻鋒特指之什。廣東新會人、後僑居美國的林文聰作戊戌詩多首，在〈變政〉中有這樣的詩句：「天道自強宜不息，人心如夢豈相關。由來振始難為力，況復旁撓貴近頑。」在〈哀死事諸君子〉中，有「四閱月中仍復舊，可憐流血付東風」的感嘆。在〈八月復垂簾〉中作這樣的吟詠：

淒然長樂曉鳴鐘，又是垂簾出九重。侍夜稔聞歌赤鳳，早年不悔賣盧龍。憑權烜赫由親貴，成例拘迂說祖宗。白馬清流寧免禍，瀛臺慘甚至尊容。⁵⁴

詩人在為「死事諸君子」和「瀛臺至尊」感傷之餘，怒毫已直指「近頑」、「親貴」以及某些避禍自保的「清流」了。黃遵憲戊戌〈感事〉第七首中有「改子終傷慈母恩」、「杯弓蛇

⁵² 陳懋鼎：《槐樓詩鈔》，民國己丑年(1949)上海刊本，頁五至六。

⁵³ 《人境廬詩草箋註》，中冊，頁779-94；王斌(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二冊，頁414；《宜園詩稿》，頁三、四；顧震福：《跬園詩鈔》民國乙亥年(1935)刊本，卷一，頁十三；姚永概：《慎宜軒詩集》，己未年(1919)鉛印本，卷三，頁五；曹元忠：《箋經室遺集》，民國辛巳年(1941)鉛印本，卷十七，頁十一；黃維翰：《稼溪詩草》，1921年南昌刊本，卷一，頁三；《東莞詩錄》，卷六十三，頁六。

⁵⁴ 《避庵詩存》，卷上，頁六。

影負奇冤」、「先累維新案盡翻」等句。對太后「臨朝訓政」「悉反」「上所興革」以及楊崇伊、袁世凱等人的告密，進行了抨擊。金天羽作〈政變〉兩首，其中有「北軍產祿兵堅握，東市膺滂血辦流」等句。用死於獄中的東漢太學生李膺、范滂喻指「六君子」，用漢初為害漢室的呂產、呂祿影射握有北直兵權的榮祿。宋恕也作〈新樂府霍家奴〉，諷刺「帶甲十萬威九區」的「武夫」榮祿。⁵⁵

在戊戌紀事詩中，也有部分詩什意蘊比較曖昧，有的則是頌揚政變的。江蘇武進（今常州市）屠寄，進士出身，曾任浙江知縣，後究心東北和蒙古史地。他在〈書戊戌八月十三日事〉中同情維新和死事諸君，但又說「詔書未忍窮鈞黨，比似前朝禁網寬」，作出一種諷揚參半的吟詠。福建閩縣（今福州市）李宣龔也有〈八月十三日感事〉，浙江山陰（今紹興市）俞明震寫有〈戊戌九月和宋燕生作〉三首，意蘊含蓄深晦。安徽桐城姚濬昌作有戊戌〈秋日即事雜書〉和〈秋夜贈客〉等詩，用「寒節近」詠指「詔徵名醫」，用「金風變」詠指「下詔垂簾」，詩末發出「多少幽懷何處盡，蒼梧綿邈隔雲端」的感嘆。⁵⁶姚濬昌，字幕庭，號竹山，姚瑩之子，早年曾入曾國藩幕，時年六十六歲，任湖北竹山知縣。他的詩雖詠及「垂簾」和「徵醫」，但或由於「隔雲」，不勝「幽懷」難盡之隱。

有的詩什卻是坦懷的，但表現出的是對維新有所評議的心聲。江西南昌曹伯繁寫有〈戊戌書感〉四首，請看第一首：

澄清攬轡上公車，應詔爭看入直初。儼似天人三對策，抗陳利弊萬言書。奇才帝以大蘇視，變政人疑介甫如。不學殷周參損益，偏教古制盡消除。

詩中還有「一朵紅雲方捧日，滿天白露已成霜」、「漫道匯征保家國，那知內亂構宮廷」、「主盟忽梗來袁紹」、「柴市淒涼碧血濺」、「宮府未能聯一體，惜他忘讀出師篇」等吟詠。⁵⁷不難看出，詩人對維新是同情和惋惜的，對「袁紹」之輩是蔑視和氣憤的。但對維新的不能「參損益」而將「古制盡除」提出了批評，又總結出「宮府未能聯一體」是造成「碧血濺」的主要原因。這樣比較能從理性態度出發、注意具體分析的評詠在諸多戊戌記詠中是比較特出的。

有的戊戌記事詩則表現了反維新、褒政變的態度。請看余懌〈書事〉一首：

⁵⁵ 《人境廬詩草箋註》，中冊，頁789-90；金天羽：《天放樓詩集》，〈谷音集〉卷中，頁二；《宋恕集》，頁818。

⁵⁶ 趙震（編）：《毗陵詩錄》，卷八，頁二十二；李宣龔：《碩果亭詩》，卷上，頁五；孫雄（編）：《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五編，下冊；姚濬昌：《五瑞齋詩鈔》，卷八，頁十四至十六。

⁵⁷ 曹伯繁：《半逸山人詩草》，辛酉年（1921）刊本，卷二，頁一。

何時截斷中西界，籌餉籌兵力自強。千古聖王當困阨，五洲種類感蒼茫。驚聞堯母重親政，詔索朋奸半遁洋。鶴淚華亭誰顧問，傷心朝野話滄桑。⁵⁸

余懋，字勒夫，湖南平江人，甲午前供職臺灣通志總局，甲午戰爭時曾隨軍至山海關一帶。他又把「籌餉籌兵」看成為「自強」的關鍵，看來是屬於湘系的洋務派。他稱頌「堯母」、譴責「朋奸」，表現出反維新的態度。江蘇江都（今揚州市）李豫曾以〈南海潮〉為題作詩，肆意詆譏康有為等維新派：

南潮起疾風，吹水連天黑。天黑猶可待，潮湧不可測。中原無地不波濤，象罔人立天吳驕。牛神蛇神挾妖怪，前唱寥寥後刁刁。乖龍削耳傅兩翼，飛入天倉攫肉食。雷公擊鼓風伯號，列缺提鞭旗獵獵。舉國惶駭逐瘦狗，如飲狂藥分道走。小兒黃口學大舌，老儒豁齒忌衰丑。在近攘臂在遠呼，斫刀不惜好頭顱。蜉蝣竭盡撼樹力，天風會折大鳥翼。南海水，南海來，鯨鯢跋浪為禍胎。南海水，南海去，鞭斥陽侯百神助，捧出朝暎撥雲霧。⁵⁹

此詩將「南海」來的風潮繪形繪色，「天黑」、「不可測」、「牛神蛇神」、「妖怪」、「蜉蝣」、「鯨鯢」、「乖龍」、「瘦狗」、「逞「刁」、「禍胎」等貶蔑性語匯充斥全紙，又用撥開「雲霧」、捧出「朝日」影喻政變。應該說其表達的是后黨頑固派的心聲。

五、「慷慨悲歌氣若虹」

戊戌維新作為近代中國「學習外國改革政治」的一次嘗試雖然失敗，但維新志士的愛國變革精神氣貫長虹，感人至深，這在志士的獄中詩、時人的哀悼詩和懷人詩中得到了反映。

六君子被殺後流傳有林旭、譚嗣同和楊深秀的獄中詩。林旭〈獄中示復生〉寫道：

青蒲飲泣知何補，慷慨難酬國士恩。願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⁶⁰

林旭犧牲時年僅二十四歲，他深懷光緒帝待以國士之恩，對袁世凱的叛賣無比憤慨。譚嗣同〈獄中題壁〉傳登於報章，梁啟超收錄於《飲冰室詩話》，流傳很廣。詩曰：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⁶¹

⁵⁸ 余懋：《求實學齋詩文集》，光緒年間刊本，〈鄭遊吟草〉卷一，頁二十一。

⁵⁹ 李豫曾：《北橋詩鈔》，民國甲戌年（1934）刊本，卷一，頁三十五。

⁶⁰ 林旭：《晚翠軒詩集》，1936年鉛印本，頁四十二。

⁶¹ 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增訂本），頁287。

前兩句用東漢官員張儉和杜根喻指逃亡中的維新派並自喻。張曾逃逸追捕，杜被執後也因忍耐裝死得以死裏逃生，最後都得以重執朝政。詩中借此二典用以表達對維新派再起的憧憬。後兩句頗多歧義。「兩昆侖」，梁啟超說，指的是康有為和大刀王五王正誼。一說非特指而是指「死者」和「行者」。筆者取後說。後兩句當是譚對自己所抱視死如歸精神和生當頂天立地、死當感人肺腑坦蕩胸懷的一種盡然發抒。楊深秀《獄中詩》為他《雪虛聲堂詩》所未收，初附於《南海先生詩集·明夷閣詩集》。詩中有「久拼生死一毛輕，臣罪偏由積毀成」句，⁶² 表現出他在八月六日政變發生後，不避艱危，抗疏「請太后速撤簾歸政」，為挽救維新大業敢於「拼生死」的浩然氣概。

有感於六君子的哀輓詩是很多的，其中有的是組詩。宋恕於戊戌秋寫有〈哭六烈士〉四首。宋恕，字燕生，又字平子，浙江平陽人。戊戌年在上海，與章太炎、孫寶瑄等友善。吳保初稱他「意曠九州外，神遊三代中」。他雖然與康有為在維新變法的策略上有分歧，但對有人駁《孔子改制考》卻別有看法，說：「長素非立言之人，乃立功之人。自中日戰後能轉移天下之人心風俗者賴有長素焉。……八比廢……亦長素功也。長素考古雖疏，然有大功於世，未可厚非也。」1896年秋譚嗣同來上海時與宋有交往，宋寫有〈贈譚復生〉詩。譚也曾作〈酬宋燕生道長見報之作即用原韻〉回贈。⁶³ 宋在〈六哀詩〉第一首中有注：「嗣同夙慕宋陳同甫，故自名嗣同。」陳同甫，即陳亮，是南宋著名的愛國者，永康學派創始人。譚嗣同因仰慕陳亮而名一事為許多識者所未言，它對了解譚的生平行事頗有啟迪。

另外，湖南湘潭梁煥奎寫有〈西市哀〉。此人是一位青年學子，後留學日本與陳天華等同學。他這首五律詩的最後兩句是「當時志慷慨，行路心顏摧」，深為六君子事迹所感動。前已述及的福建人康詠也寫有〈題六君傳後〉，稱詠六君子是「撥亂」的「人傑」，「銜冤」的「鬼雄」。⁶⁴ 1901年，康有為逃亡在檳榔嶼，作〈六哀詩〉，成五首，末首於次年去印度大吉嶺後續成。用五言長詩體裁詠述六人生平事迹，實是一組戊戌六君子的詩史。

在戊戌哀輓詩中更多的是單個人的輓詩。盛昱有哀悼楊銳的〈杜鵑行〉一首。盛昱，字伯希，滿洲鑲白旗宗室，光緒丁丑年(1877)進士，時任國子監祭酒。他供職於翰林院時屬於以翁同龢為支柱的後清流。甲午戰後同為帝黨官員之列。他在詩中詠及當年清流前輩黃體芳等人與楊銳折年輩「論文」，稱譽楊為「白衣少年佐天子」，其遺稿「篇篇血淚痕」。但詩中有「翻雲覆雨驟雷霆，竟與逆人同日死」之句，看來他對戊戌維新是既同情又有保留。嚴復與林旭同是福建侯官(今閩侯)人。他有〈哭晚翠〉

⁶² 《萬木草堂詩集》，頁95。

⁶³ 《宋恕集》，下冊，頁815-16，803；《飲冰室詩話》，頁10；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上冊，頁220；《譚嗣同全集》，頁244。

⁶⁴ 梁煥奎：《青郊詩存》，壬子年(1912)長沙刊本，卷一，頁1；《漫齋詩稿》，頁六十六。

五言長詩一首，詩注中記述：「余以戊戌六月晤晚翠，而晚翠以八月遇難。」詩中稱譽這個同鄉後輩是「奇才」，是「國秀」，嘆惜林旭等人的「資群策」竟被翻成「罪秀言」，竟遭「覆盆」「沉冤」且禍及「親尊」。⁶⁵

譚嗣同是維新志士中的一員猛將，時人對他的哀悼詩特多。浙江杭州夏曾佑為光緒進士，曾充兩江總督署文案。與譚嗣同、梁啟超政治學術相投，也曾共研佛學。譚死事後他有〈哭譚復生〉詩。湖南長沙皮錫瑞治今文經學。戊戌年春，任南學會長，主講學術，縱論變法圖強。他在〈哀譚復生〉詩中有這樣的吟詠：「訪我來南學，看君上大廷。……曾無紈袴習，竟枉棟梁材。滄海橫流酷，人間大可哀。」⁶⁶對這位同省後學不勝稱譽哀悼之情。孫寶瑄，字仲瑛，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人，李瀚章之婿。時住上海，為滬上名士。1896年譚嗣同來上海與他多有過從。孫有〈輓譚復生〉兩首，詩注中述及，丙申秋曾與譚嗣同、宋恕、汪康年、梁啟超等人合映一像，又曾與譚等飲於外國酒樓，共談佛理。試錄其詩第一首：

慷慨悲歌氣若虹，志扶赤縣有陳同。可憐變法須流血，莫讓先生血獨紅。⁶⁷

詩中的陳同是陳同甫的簡稱，喻指譚嗣同，孫在詩注中記述了譚被捕前夕準備為變法流血的一席話，「氣若虹」、「有陳同」、「須流血」、「血獨紅」，這首字字有聲的詩實是譚嗣同的慷慨精神在詩人心靈上的一種強烈回應。譚嗣同好佛學，長沙人羅傑後作有〈讀佛經憶譚嗣同〉五絕句一首：「佛理奧微處，雄談憶昔春。君研菩薩現，已就殺身仁。」羅小譚嗣同一歲，後曾任湖南諮議局審議長，詩中對某春譚與他雄談佛理記憶猶新，他對譚已成就佛果，殺身成仁，不勝景佩之情。無罣礙齋主是一位僧人，他在宣統年間追作〈吊復生〉三首。詩注中有「我讀《仁學》，心便醉」之語。試錄其第一首：「壯飛已矣復何言，誓說人間勝九原。不識浮生安抵夢，斷腸愁絕聽啼猿。」表達了佛心對「浮生」的一種傷悲。譚嗣同死後，他的學術和精神得到廣泛傳播。從陝西舉人劉光蕡所撰〈壬寅秋吊譚參政復生步題麥幼博扇面原韻〉三首中可見一斑。⁶⁸詩一中稱頌譚「奉詔入京僅十四日即被禍」是「奇忠冒死」，用「獄底歌詩雄一劍」句讚揚他「我自橫刀向天笑」的慷慨精神。在「裹帛難醫烈婦哀」句下有注：「夫人李氏聞耗投江不死，哭訴於湘撫陳公署，袖短刀自刎，血噴陳公袖，陳大驚，出奇藥以帛裹敷，送歸寓。數日不食，忽大呼某相國名，手自裂帛，血湧丈餘死。」這段

⁶⁵ 孫雄（輯）：《四朝詩史》，宣統年間硃印本，甲集卷五；《嚴復集》，第二冊，頁362。

⁶⁶ 夏曾佑：《夏別士先生詩稿》，婿朱義唐手錄本；《譚嗣同全集》，頁559。

⁶⁷ 《忘山廬日記》，頁263。

⁶⁸ 羅傑：《唾菴詩集》，民國四年（1915）宣南刊本，〈瀛萍集〉卷五，頁三；釋無罣礙齋主：《無罣礙齋殘稿》，民國甲戌年（1934）鉛印本，詩卷上，頁二；劉光蕡：《煙霞草堂文集》，1918年蘇州刊本，卷十，頁十三。

對譚夫人李閏的記事為許多譚傳所未及，雖只是當時的一種謠傳，但從中亦可見人情民心之所關。詩二中有「改文直是行天馬，振懦開頑又爾逢」句，讚揚譚嗣同「文如天馬行空倏忽萬里」，稱頌他的《仁學》起了「振懦開頑」、「闢鴻蒙」的啟蒙作用。

戊戌政變後，頑固派「窮捕志士」，「株連慘戮」維新「黨人」，除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外，康有為、梁啟超等逃亡海外，徐致靖遭永遠監禁，李端棻、宋伯魯、張蔭桓等發往新疆，張元濟、陳寶箴等人被革職永不敘用。這些遭迫害的維新人士的精神和事迹在他們所作的感事詩和時人所作的懷人詩中得到了許多的記詠。李端棻被流放後，廣西全州籍御史趙炳麟作〈天寧寺送李苾園端棻司寇西戌〉詩贈行。有這樣的詩句：「橐筆蓬萊三十年，春風桃李滿埃垠。……攬轡尚多憂國淚，荷戈為掛黨人篇。」李端棻，字苾園，貴州貴築（今貴陽）人。同治進士。曾典試山西、四川、山東、分校順天鄉試、督雲南學政，充壬辰年（1892）會試副總裁，喜「獎拔士眾」。甲午戰後第二年疏請立京師大學堂。百日維新中禮部尚書許應騷、懷塔布等阻撓新政被革後，他遷授禮部尚書。這些吟詠是對教育三十年桃李遍天下的稱譽。趙與李同屬帝黨官員。所以詩中對李的「憂國」和作為「黨人」被「荷戈」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傷。宋伯魯，字芝棟，陝西醴泉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戊戌維新時任御史，多次為康有為代遞奏摺，又曾與楊深秀合疏彈劾許應騷等守舊迂謬，阻撓新政。山東後學王丕煦作有〈驚聞李宋兩師獲譴賦以誌懷〉詩四首。詩中對李的「薦賢」和宋的「孤忠」深表敬意。並在詩注中說：「政變既作，除林、楊等殉難外，一時連累去職者達三十餘人，朝列為之一空。」張蔭桓，廣東南海人。長期任職總署，與康有為同鄉，曾介紹康往謁翁同龢。文悌在嚴參康有為摺中詆之為「黃緣要津」。他被謫戍新疆後，許珏作〈賦呈南海張尚書〉。⁶⁹許珏，字靜山，號復庵，光緒壬午年（1882）舉人，曾隨同張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故作詩送行。

人境廬主人黃遵憲被梁啟超稱為詩界大家，梁說：「公度之詩，詩史也。」⁷⁰黃因參與維新，在政變後被看守於滬北洋務局，後經疏解允其回鄉閑居。他有〈紀事〉、〈放歸〉等詩詠及此事。他與維新人士交遊廣泛，戊戌政變後寫有〈己亥懷人詩〉二十四首，懷念陳寶箴、徐致靖、李端棻、張元濟、李岳瑞、熊希齡、江標、吳德瀟、陳三立、俞明震、徐仁鑄、嚴復、夏曾佑、皮錫瑞、曾廣鈞、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其第二首寫道：

紛紜國是定維新，一疏驚人泣鬼神。尋遍東林南北部，一家鈞黨古無人。⁷¹

⁶⁹ 《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下冊，頁774—91；趙炳麟：《柏岩詩存》，收入《趙伯岩集》第十三冊，卷一，頁五；《韜毅詩存》，頁七；許珏：《復庵遺集》，詩集卷二，頁七。

⁷⁰ 《飲冰室詩話》，頁63。

⁷¹ 《人境廬詩草箋註》，中冊，頁848。

徐致靖，字子靜，江蘇宜興人，寄籍宛平，光緒二年(1876)進士。戊戌維新時任內閣侍讀學士。曾上由康有為代擬的〈請明定國是疏〉。百日維新中他被授為禮部侍郎。其子徐仁鑄，光緒己丑年(1889)進士，戊戌前一年視學湖南，積極推助維新。政變起，被免職。曾乞父密薦康有為、梁啟超、張元濟、黃遵憲、譚嗣同等人。其父被逮後，上書請代父囚。這首詩即詠述徐致靖上請定國是疏和「一家鈞黨」事。

六、「回天猶有待，責任在吾徒」

譚嗣同在〈臨終語〉中說：「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百日維新在政治上被絞殺了，但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世紀轉折之際，維新變法作為一種歷史潮流仍在向前發展。1901年梁啟超在〈留別澳州緒同志〉六首中吟詠說：「民權初發軔，王會已成圖。」「回天猶有待，責任在吾徒」。⁷²他認為，民權事業雖剛開始，但必成大業之際會已經展現，挽回局面的責任全在維新派們的肩上。

戊戌政變後又發生了「己亥建儲」、義和團運動興起、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等一系列事件。在這種錯綜複雜的時局下，人們反思歷史，認為造成這種危局的直接原因是慈禧和頑固派撲滅維新所致。庚子年顧錫汾在〈書以奉答〉四絕句中記詠道：「內訌外患勢交掀，政變分明是禍根。東市殘魂南海淚，小臣到底未辜恩(新黨力圖變法，每以若再守舊，內訌外患交迫為言，今果驗實)。」顧錫汾，字萃夫，江蘇太倉人，他譴責政變，讚頌譚、康，在稍後所作〈讀《新民叢報》即事〉一首⁷³詩中有「學界新傳革命文」、「我望東瀛一頂禮」等詩句，可見他當是維新運動的擁護者。

在許多譴責政變的吟什中，許多人的韻鋒直指慈禧和頑固派。康有為在〈聞菽園居士欲為政變說部詩以速之〉中詠述說：「自從戊戌八月後，天昏霧暗黑山河。……舊黨獻諛枉一國，大周受命頌駱駝。」他把慈禧太后說成是改唐為周的武則天。丘逢甲在〈奉答人境廬主〉、〈題駱賓王集〉、〈題太白醉酒圖〉等詩中影射諷刺慈禧是「偽臨朝」、「楊貴妃」。當年武則天曾自稱金輪聖神皇帝。丘逢甲認為解救時局的辦法是「不須復古但尊王」，「早教廉撤聖神皇」。⁷⁴這表達了一種「保皇」、反慈禧的心聲。

當時除了維新派，在地位較低的士人和官吏中暗罵慈禧的也大有人在。如陝西渭南的一位冷宦焦繼華在〈讀史〉兩首中用渲染「女禍」的筆韻，影射慈禧是呂后、武則

⁷² 《譚嗣同全集》，頁287；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上海：中華書局，1940年)，頁十四。

⁷³ 顧錫汾：《柿影樓詩稿》，1929年排印本，頁十八。

⁷⁴ 《萬木草堂詩集》，頁124；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61，181，194。

天和賈南風。⁷⁵更耐人尋味的是，長期隨侍張之洞的張英傳，也在武昌總督官署內吟詩抨擊慈禧。試看他的〈庚子感事〉第十首：

廿年為母子，一旦變參商。治國俱無策，爭權反有方。兩宮恩已斷，群丑勢彌強。莫怪英人笑，吾邦女主昌。⁷⁶

張英傳，字颯生，號瓠肥，張之洞的族孫，但年齒大十一歲，長期在張之洞身邊照料。他反對義和團，又詆譏康梁，政治觀點近於張之洞。但他是一個平庶子民，又是私下寫詩，自不必像他家主那樣總是看太后的臉色和動向行事。

戊戌維新失敗後，康梁等在海外組織「保皇會」。1900年8月發生了自立軍事件，唐才常、林圭等人死難。唐才常與譚嗣同同鄉同學，為「二十年刎頸交」，同屬於維新派中的激進之士。譚遇害後，他曾在〈戊戌八月感事〉中吟詠說：

殷憂耿耿在神州，時事如斯孰與謀。南海行蹤空想像，中原大局半沉浮。滿朝舊黨仇新黨，幾輩清流付濁流。千古非常奇變起，拔刀誓斬佞臣頭。⁷⁷

他在遭張之洞殺害時，留下「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濺荒邱」兩句〈臨難詩〉，實踐了自己的政治誓言。湖南武陵（今常德市）何來保，字鐵笛，也是譚嗣同的「生平肝膽交」。在戊戌維新運動中是《湘報》重要撰稿人之一。自立軍事件中他「實任衡湘一切布畫」。後被執於湖南辰州（今辰溪），檻送至長沙遭殺害。留有絕命詞四章，為梁啟超《飲冰室詩話》所收。自立軍事件是戊戌維新潮流的一種發展和轉折，長期來對其武裝勤王性質的認定頗費躊躇。黃遵憲在〈唐紱臣明經〉一詩中有這樣的吟詠：「人言秘篋中，別藏法三章。意實主民權，假託尊王綱。又言三日穀，縱兵肆跳踉。據掠得幾何，概許歸囊囊。是皆莫須有，秘獄誰能詳？……明明勤王師，轉以賊名揚！」⁷⁸黃遵憲被稱為晚清「詩界維新鉅子」，他在這詩中不相信自立軍會「縱兵」「擄掠」這是對的，但把「意實主民權，假託尊王綱」之說也歸之為「莫須有」就不那麼準確了。自立軍失敗後的時局仍是很沉悶的。江蘇梁溪（今無錫市）蔣士超在〈紀事〉詩中詠嘆說：

地球大戰國，南宋小朝廷。紅黑黃奴痛，百千萬劫經。逐臣違故國，名士感新亭。誰為觀獅睡，沉沉夢未醒。⁷⁹

⁷⁵ 焦繼華：《亦耕草堂詩鈔》，光緒壬寅年（1902）刊本，卷三，頁十七。

⁷⁶ 張英傳：《瓠肥詩存》，北京圖書館藏手寫本，第六冊。

⁷⁷ 《唐才常集》，頁263，265。

⁷⁸ 《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下冊，頁751-52；《飲冰室詩話》，頁16；《人境廬詩草箋註》，下冊，頁1013-14。

⁷⁹ 《振素庵詩鈔》，頁六。

「猛憶西歐前世紀，民權勃萃鬱風雷」。在梁啟超等維新派看來，只有學習前世紀西歐啟蒙思想家之所為，進行民權思想鼓吹，造就新國民，才能造就新中國。梁啟超在〈自勵詩〉中寫道：「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⁸⁰ 他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宣傳新文化，呼喚新國民，成為二十世紀初中國「輿論界的驕子」。雖然戊戌維新後康梁維新派仍是難以割斷縈繞心中的「聖主」情結，但其實他們中許多人宣傳的主旨仍是民權思想。浙江諸暨人蔣智由與梁啟超友善，同黃遵憲、夏曾佑被梁推許為「近世詩界三傑」。他就極力主張進行民權思想鼓吹。請看蔣的〈盧騷〉：

世人皆曰殺，法國一盧騷。《民約》倡新義，君威掃舊驕。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⁸¹

戊戌維新及其以後的一段時期內，維新派人士努力介紹和創立新文化。除梁啟超外，黃遵憲是「詩界革命」的泰斗，嚴復是近代中國介紹西學的第一人。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介紹和稱讚黃遵憲所作的提倡尚武精神的〈出軍歌〉等詩作。1905年黃逝世後，湖南湘潭人陳曾（字可毅）在〈池晚遊韻〉中還發出「一自國無黃叔度，更誰人作出軍歌」的感嘆。陳曾還在〈讀近人詩〉中讚詠嚴又陵：「倘知西學原東學，應悟詞家即哲家。希臘詩歌傾世界，煩公輸入到中華。」另外，夏曾佑在〈寄嚴又陵〉一首長詩中對嚴復的翻譯西學書籍極加稱詠，他認為嚴復能深聞西學的「大道」即能闡明物競爭存的事理，所以能建立起譯書的「盛業」。⁸² 這首詩高度評詠了嚴復在介紹西學方面的傑出的地位。

戊戌政變促使中國政治分裂，不僅有新舊之爭、共和與立憲之爭；同是立憲，也有海外和國內之別。戊戌政變後，國內原先的維新勢力也有不同情況。有的參與維新活動的官員與士人，政治上受到打擊，思想也開始消極，他們除了在詩什的唱和中發出類如「愚儒那有苞桑計，白發疏燈一夢醒」⁸³ 的感嘆外，再沒有當年積極參與維新的作為。有的官員和士人在政治上未受到直接打擊，仍從自己的境況出發為可能的變革作出自己的努力。張百熙在政變時坐「濫保」康有為革職留任。不久，開復處分。他寫有〈秋感〉八首和〈意有未盡再題二律〉，以聊抒「幽懷」，並詠述處分和開復事。試錄〈秋感〉第六首：

⁸⁰ 麥孟華：〈辛丑歲暮雜詠〉，載《蛻庵集》，民國丙子年（1925）鉛印本，上卷，頁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頁十六。

⁸¹ 鐘鼎（選注）：《近代詩一百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06。

⁸² 孫雄（編）：《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第二十編下冊；《夏別士先生詩稿》。

⁸³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宣統元年（1909）刊本，卷上，頁五。

戎氛近逼姬周日，黨禍紛起趙宋年。憂極真思蹈東海，時危忍見哭伊川。乾坤擾擾事未已，風雨瀟瀟秋可憐。萬里敢忘心報國，諸君應有力回天。⁸⁴

張為湖南長沙人，同治進士，長期作學政、典試等學官。辛丑後，曾充管學大臣，主持京師大學堂，為創立新學制、辦學堂、派留學做了許多工作。這也是這類參與維新人士不忘「報國」和對「回天」的一種努力。孫詒讓是晚清著名的古文經學家，他贊同變法，乙未年在家鄉瑞安組織興儒會。辛丑後響應清廷「新政」，請看他〈自題變法條議後〉八首之五：

黨獄紛紛士氣傷，秋荼禁網到文章。蘭陵祭酒杜門久，猶有新書法後王。

他在詩注中說：「光緒辛丑天子將更法自強，廣求眾議。友人囑為具稿。乃以周禮為綱，西法為目，成以冊篇，陳古剴今，覬以杜守舊者之口。」⁸⁵聯想到張謇戊戌維新期間列名上海強學會，並參擬〈大學堂辦法〉，但與康梁變法的策略有異。此時也積極撰〈變法平議〉，促成了「江楚會奏」。由此可以認為，辛丑後的維新立憲運動是戊戌維新潮流的一種折變和繼續。

戊戌政變後，維新變法潮流在迂迴曲折中發展和分化，有的青年士子從這場運動中吸取經驗和力量，對「學習外國改革政治」作出新的思考和努力。鄒容在戊戌維新時還是一位少年，但他成長為青年革命家與戊戌維新潮流給他的教育和推動有關，請看他的〈題譚嗣同的遺像〉詩：

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⁸⁶

鄒容把自己看作為是譚嗣同事業的「後來者」。這正表明了共和革命潮流與戊戌維新的歷史聯繫。其時，廣東姚宇陶作〈戊戌政變觀〉古體詩一首，對戊戌維新作了全面的評詠，詩末在詠及「老佛」「回宮」後作這樣的感嘆：

謀臣頸白紛飛紅，天子縛束囚樊籠。新黨竄逐不留蹤，回復舊政一一皆與前相蒙。百日維新命運終，何時還魂降大空，捲土重來長作中國主人翁？⁸⁷

姚宇陶，字菊隱，廣東平遠人。他是同盟會員姚雨平的同鄉和老師。從姚雨平在為他的詩集寫的序中可知，姚宇陶甲午後「倡言維新」，「新政失敗」，「宗旨不變，謂新機既啟，勢難久抑」。到庚戌年(1910)入都，「見盈庭腐敗如故，頑固如故，政治革新之希望已絕」，於是「乃一變而主破壞」。辛亥革命軍起，他參與姚雨平所提師的「北

⁸⁴ 《退思軒詩集》，卷五、六。

⁸⁵ 《瑞安詩徵》，1946年瑞安縣修志委員會鉛印本，卷五，頁四十八。

⁸⁶ 周永林（編）：《鄒容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年），卷一，頁四。

⁸⁷ 姚宇陶：《潛園詩草》，民國初刊本，卷一，頁四。

伐」。姚宇陶在戊戌政變後，繼續為維新努力，最後成為共和革命的參加者。由此可以認為，雖然共和革命與戊戌維新是並行發展的，不存在直接繼承關係。但起先維新是顯流，革命是潛流。而在二十世初新的歷史條件下，維新潮流發生了折變與分化，像姚宇陶這類維新論者也逐漸轉向革命。就此而言，共和革命潮流也是對維新潮流的一種發展和吸收，力圖實現譚嗣同們「回天」的願望。

以上是清季詩史中關於戊戌維新的一些記詠。全文共徵引有關詩集八十八部，其中手寫本三部；徵引九十六人的詩作，這些詩作者的籍貫涉及十七省。就他們的社會身分來說，有維新派代表人物，有帝黨重要官員，但佔多數的是不很知名的中小官員和士人，他們中有公車上書的連名者和強學會的列名者，有各地維新報刊的重要撰稿人，也有政治文化名人的後裔；此外，還有宗室、宦宦眷屬以及僧人等。他們雖然身分不同，地位有異，但都為國勢擔憂，憧憬改革，因而不同程度地支持或同情維新。另外，也有少數詩作者是頑固守舊的官員和士人以及看太后臉色行事的洋務大員。這些詩什所吟詠的時間範圍，從「公車上書」到「百日維新」以及自立軍失敗後的一兩年間，大體上涵蓋了戊戌維新作為一個歷史潮流所經歷的發生、高潮到轉折的過程。「言為心聲」。這些從廣泛地域和社會層面所表達的對戊戌維新的態度無疑是我們戊戌維新史研究的一種有價值的感性材料，可對既有維新史料起一種佐證、參照和補充作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e “Wuxu Reform” in Late Qing Poems

(A Summary)

Liu Xuezhao

The deep influence of the Wuxu (1898) Reform is not only felt through history, but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poem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 I edited the related poems collected from more than ten Chinese libraries twenty years ago into an article as an addendum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My present article quotes eighty-eight collections of poems (including three handwritten copies) written by ninety-six persons whose native places spread over seventeen provinces. Some of the writers were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 Reform Group and the senior officials supporting Emperor Guangxu. But the majority were middle-ranking or junior officials and ordinary intellectuals, including candidates of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 who submitted a joint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members of Qiangxue Society, writers for the newspapers championing reform and descendants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notables, including also royal clansmen, dependants of official families and Buddhist monks, and many others. Although their identity and status were different, all of them were worried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longed for reform, supporting or sympathizing with the Reform in varying degrees. A minority of the writers were the conservative diehards and high-ranking officials who changed their behaviour according to the Empress Cixi's expression. One's words reflected one's thinking. Undoubtedly,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Wuxu Reform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nd social strata provide us with valuable materials as a kind of evidence and reference that significantly complement the Reform studies.